

文化小考

□李思虎

作为夏县十大历史人物之一，李悝何以能从众多河东人杰中脱颖而出、名垂青史？这就要从李悝变法说起。

战国时代，七雄争霸。李悝作为战国初期魏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前期法家代表人物之一，首开我国法治之先河，助力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最早进行改革的诸侯国。韩、赵、魏三家分晋时，魏文侯被周天子册封为魏国开国君主，定都安邑。为了富国强兵，魏文侯礼贤下士，招揽了李悝、吴起、西门豹、卜子夏等大批人才，而李悝以“魏文侯相”和“魏文侯师”的身份，在魏国主持变法。

李悝废除了世卿世禄制，在政治上提出“为国之道，食有劳而禄有功，使有能而赏必行，罚必当”，削弱旧贵族的力量，起用新人；经济上主张“废沟恤”，推行“尽地力之教”，废除井田制，鼓励发展农业生产，推行重农抑商政策；军事上，他改革军事制度，建立“武卒”制，大力奖励军功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平淮书》中曾说：“魏国李悝，尽地力，为强君，自是以后，天下争于战国。”而李悝最突出的事迹就是在春秋以来各诸侯国颁布的成文法基础上，编撰了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——《法经》。这既是对当时各国法律的总结，亦是后世秦汉法律之蓝本，李悝因此被奉为战国法家之祖。

《法经》共有六篇，即《盗》《贼》《囚》《捕》《杂》《具》。《盗》指窃取财货，这是保护封建私有财产的法规；《贼》是指对人身体的侵犯，甚至犯上作乱，是防止叛逆、杀伤，保护人身安全和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法规；《囚》是指囚捕盗贼，是关于审判、断狱的法律；《捕》是关于追捕犯罪的法律；《杂》是对狡诈、越城、赌博、贪污、淫乱等违法行为的惩罚；《具》是根据犯罪情节和年龄情况，对判罪定刑、加重或减轻的规定。

李悝《法经》之今辨



显然，李悝变法的主要内容是惩治盗贼，以保护地主阶级的人身和财产安全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。“一断于法”，打破“刑不上大夫”的传统，体现法家“重刑轻罪”的思想。用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，《法经》中包含了可贵的廉政思想和吏治思想。

《法经》提出“事断于法”，主张“罚必当”。《杂》中规定：丞相收受贿赂，其左右（助手、副职）处死刑。将军以下收受贿赂者，一律处死刑。贿赂的金额不足黄铜

二十四两者，免予科刑。这是中国最早的关于整治官吏贿赂罪的法律条文。

《杂》中还有相当比重的关于吏治的条款。官吏犯法，其罪重于常人。在具体的量刑上，有明确的对比，如常人聚众赌博犯禁受罚金，而太子聚众赌博则会受到鞭刑以至被废黜的重处；官吏利用职权牟利则要受到法律制裁，而且不论情节轻重，都构成犯罪，程度只作为量刑依据。由此看来，无论是违反了一般法禁或者特定制度，随着犯法者等级提高，

刑罚也相应加重，这正反映了“重治吏”的思想。这种以公开成文法的形式具体规定对官吏的严格处治，比之奴隶社会“礼有等差”“法不加之尊”的原则来说，无疑是一次重大进步。

李悝的《法经》是其法治思想的结晶，同时也是春秋战国以来第一部系统的法治论述，在当时也是前所未有的。它突破了“法在官府”的历史，开始真正根据社会的变化制定法律，并且从魏国变法开始，法典的所有内容都对外公布，具有极为前沿的社会实践意义。李悝汇集了各国的刑法，编写成《法经》一书，试图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，维护封建法权。《法经》原文虽然早已失传，但对后世的法律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《法经》的推行，加上魏国其他富国强兵政策的实施，使战国初期的魏国“辟土四面，拓地千里”，成为当时强盛一时的霸主。李悝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变法第一人，其《法经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。李悝的一生几乎与法家思想的兴起和发展同步，是法家学说的重要奠基人。

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。李悝变法的法治思想，在两千年后的今天，仍然对我们有重要的启迪作用。

李悝，这位法网的编织者，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”，他的这种“敢为天下先”的精神，激励着我们在新的时代，也要勇于改革，勇于为正义和公正发声，勇于为国家和民族的贡献力量，李悝的精神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。

法令兴则国治，法令弛则国乱。众所周知，法治是一个国家的立身之本，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必要元素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法治能够防止贪污腐败，塑造一个风清气正的和谐社会；法治能够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，使人民获得安全感。当然，时移世易，我们要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古为今用，推陈出新，让李悝的“法治”思想在新时代开出新花朵。

艺海拾贝

临猗桌子戏

□弓巧娟

说起临猗，会想起筋道的白面馍、亲肤透气的粗布单、软乎乎的棉花被；会想起临猗人待客的荷包蛋、八大碗、十二起和三套饭；会想起看不够的桃花、梨花、油菜花、石榴花，吃不完的樱桃、白水杏、苹果、冬枣和江石榴；会想起中华农商始祖猗顿；会想起建造于元代的临晋县衙；会想起“黄河上第一朵花”——夹马口电灌站；会想起元杂剧领袖人物、中国戏剧鼻祖、“东方莎士比亚”关汉卿；会想起一招一式堪称风华绝代、一颦一笑皆现仪态万方的蒲旦宗师王秀兰；会想起曲调婉转、行腔酣畅、音韵悠长的临猗眉户。

临猗是全国戏剧大县，地台戏、桌子戏、锣鼓杂戏、眉户、道情、蒲州梆子等均名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地域特色鲜明的地方剧种组成了丰富多彩的临猗戏剧文化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观看了临猗的桌子戏。初听桌子戏，还以为是陕西老腔，后来才晓得临猗桌子戏与陕西老腔虽都是中国戏剧艺术的独特形式，但在起源、地域特色、表演形式、唱腔及传承与发展等方面却存在明显的区别。临猗桌子戏，桌子当“主角”，以桌为台，围着桌子唱大戏，跳上桌子亮高腔。

桌子戏发源于临猗县角杯镇吴王村，距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，是蒲剧



▲桌子戏表演 记者 茹雅 摄

早期的形态，一招一式都展现了黄河汉子的粗犷豪放。吴王村西临黄河，与陕西合阳县洽川隔河相望，村子历史可追溯到秦末汉初，《山西通志》也曾有关于它的记载：“昔有吴、王二姓居此，故名吴王村。”

村子依河而建，渡口因村而名。据史料记载，吴王渡始建于公元前636年，由晋文公重耳所建。重耳即位后，曾来此地巡视，认为这里西依黄河，三面环沟，只有一条古道与外界相通，是一处不可忽视的军事重地，于是拓通道、筑码头，建成了沿用至今的渡口。吴王村内

曾经四方商贾云集、各种商铺林立，南来北往的客商纷纷驻足于此，由此也成为文化融合之地。

诞生于吴王村的桌子戏，受往来商人、雇工等来自不同地域习俗的影响，融合南北文化，于劳碌闲暇之余上演，尽显“面对黄河一声吼”之势，或豪情万丈，或粗犷酣畅。

岁月如梭，吴王古渡口虽早已不见昔日的繁华盛景，桌子戏也演变成如今的模样。它没有角色行当之分，演员都是乐手，乐手都有戏码。它的曲调铿锵有力，唱腔质朴浑厚、高亢激昂，演员表

情生动、动作夸张，乐器演奏精湛。演员们大都是没受过正规训练的农民，演出中，他们或用吹胡子、瞪眼睛的表情来演出故事情节，或用高亢的唱腔、夸张的动作来展示人物的情感和性格。在表演方面，临猗桌子戏的主要表现为粗犷豪放、接地气的特点。唱到高潮时，演员跃身跳到桌子上。此时，高亢雄浑的唱腔响彻舞台，演员生动饱满的表情、雄健威武的姿态点燃全场。每每至此，台上演员酣畅淋漓，台下观众如痴如醉，只要看过桌子戏的人，都会对它念念不忘。

临猗桌子戏也使用道具，主要分为武场和文场。武场有板鼓、小战鼓、马锣、梆子、大镲、小镲、小锣等，文场则有板胡、二胡、三弦、中胡、笛子、底胡等乐器。这些道具在演出中起到了重要的伴奏和渲染气氛的作用。

数百年来，临猗桌子戏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，传唱真情挚爱，颂扬忠义仁勇，在引领风尚、教化民众、活跃生活、鼓舞人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正因为演员来自当地村民，曲目内容耳熟能详，曲调节奏口口相传，桌子戏拥有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旺盛的生命力。

一曲桌子戏，唱出了黄河的激越辽阔，吼出了黄土地的博大厚重。祝福这久经黄河水沁润、黄土地滋养的桌子戏，像老百姓的日子一样红红火火、滋味悠长。